

魯迅在廣州 《魯迅與中共》之一章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1926年8月，魯迅離開他一直工作了十多年的北京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本來他與廈門大學是簽有合約，擔任文科國文教授，兼國學研究院教授的。¹可是，到了廈大不久，魯迅即感到很不滿意。翌年1月，他轉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但也只是住了七個月左右，8月底便離開，轉赴上海。

不能否認，在魯迅與中共的問題上，廣州時期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第一，就是在廣州期間，他開始對共產黨有點認識。1927年9月，他在一篇通信裏，提到自己在廈門的時候，「還只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 [廣州] 以後，才知道其中有CP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 和 CY [Communist Youth, 共產主義青年團] 之分。」² 第二，魯迅真正意識到自己與共產黨員接觸，也是在他去廣州以後。此外，他在廣州目睹了國民黨的清黨，見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結束，對他來說，確是造成很大的影響，也是他後來轉向中共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中國大陸不少書籍及文章，卻往往把這點過分渲染強調，說在廣州期間，魯迅經歷了「思想上的飛躍」，在短時間裏成爲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甚至說魯迅在來到廣州前，已經跟共產黨員往來頻密，不久就成了共產主義的信徒。在這裏，我們要探討一下魯迅在廣州時期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希望能弄清楚一些長久以來被有意或無意掩蓋的事實。

首先，我們可看看所謂魯迅在到達廣州前即曾與中共黨員接觸的問題，這主要是以魯迅在廈門大學教書時曾經與共產黨員羅揚才有過接觸爲理由；其中包括：

一、羅揚才會經主持邀請魯迅到廈門大學平民學校成立大會上作演講，會上並與魯迅同席；

-
- 1 過往，人們一般相信魯迅原準備往廈門兩年，但最近有人據《兩地書》的原信，考證魯迅與許廣平在當時是相約好一年後便見面的；參彭樹鑫《魯迅去廈門與景宋相約是「一年」抑或「兩年」後相見辨析》，《魯迅研究動態》，1988年3期，1988年4月，頁60—61。
 - 2 魯迅《通信》，《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三，頁450。

二、羅揚才當時為廈門大學學生會交際部部長，可能主持或參與了具書挽留魯迅的行動；

三、1927年1月8日，魯迅曾到廈門的中山中學演說，羅揚才是中山中學的兼課教員，邀請魯迅之事很可能與他有關。³

羅揚才，廣東人，1906年生。1919年隨叔父到福建漳州。1924年考進廈門集美大學預科文科班，開始接觸共產主義。1925年11月正式加入共產黨，翌年一月任廈門中共總支委書記，後又兼任中共廈門大學支部書記、廈門市總工會委員長兼農民協會會長、中共廈門市委組織部長兼閩南特委委員等職位。1927年4月，國民黨清黨，羅揚才被捕，5月23日被槍決。⁴

毫無疑問，羅揚才是中共在廈門一名極為活躍的黨員；但上面舉出有關魯迅與羅揚才在廈門的「接觸」，其實有兩個很嚴重的問題。第一，這裏開列的所謂接觸，幾乎全都只是推測，根本沒有任何文字上的具體記錄。⁵第二，這些推測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當時正值國共合作，不少共產黨員也加入了國民黨。羅揚才在1926年1月，也就是魯迅到廈門前，當選為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委員兼工人部長。因此，即使我們接受魯迅與羅揚才有過緊密接觸的說法，也很難確定羅揚才是以甚麼身分來與魯迅聯繫的。就是一篇在大陸發表有關羅揚才與魯迅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認二人「雖比一般的師生關係密切，但還不是黨與魯迅的關係。」⁶

根據一名共產黨員徐彬如的回憶，在魯迅來到廣州以前，廣東大學（即國立中山大學的前身）內左右派學生的鬥爭已十分激烈。1925年間，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的學生組織新學生社，取得了較大的影響力。其中一名主要成員畢磊，為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副秘書。他們與中大委員會的委員戴季陶談判，提出有關中山大學的改革條件，其中一項便是要求邀請魯迅到中大當文學系主任。⁷

3 參汪毅夫《魯迅在廈門若干史實考》，《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4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頁128—131；衛公《羅揚才烈士的生平及其與魯迅的關係》，《魯迅研究資料》，第20輯，1988年7月，頁77—81。

4 關於羅揚才生平及其與共產黨之關係，參汪毅夫《魯迅在廈門若干史實考》，同上注，頁126—128；衛公《羅揚才烈士的生平及其與魯迅的關係》，同上注，頁75—81。

5 例如汪毅夫的文章裏談到魯迅與羅揚才的接觸時，用的字眼是「其間的親密接觸是完全可能的」、「當時邀請魯迅到學校演說也很可能與羅揚才同志有關」，同上，頁129；而衛公的文章也是用上「魯迅的赴會很可能是出於他的盛情邀請」、「此事與羅揚才不無關係」等推測性的詞句，同上注，頁78—79。

6 衛公《羅揚才烈士的生平及其與魯迅的關係》，同上注，頁80。

7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1976年10月，頁212—214。

由於沒有相反的資料，我們只得暫時採取這說法，也就是說，魯迅是經由廣州的共產黨員推動而獲邀請到中山大學任教的。⁸不過，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能說他是爲了中國共產黨而到廣州去的。在這裏，我們必須先探討一下魯迅到廣州的動機。

毫無疑問，魯迅到了廈門不久，便對廈門大學很不滿意。1926年9月4日到達廈門，八天後(9月12日)便寫信給許廣平說：「倒望從速開學，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滿。」⁹除了是因爲廈大的發展不如理想，且雜務衆多外，¹⁰最主要的是裏面有一些魯迅所不喜歡的人，其中一個是顧頡剛。在給許廣平的幾封信裏，魯迅對顧頡剛作了很嚴厲的批評：

看廈大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顧頡剛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潘家洵陳萬里黃堅三人，皆似他所薦引。黃堅(江西人)尤善興風作浪，他曾在女師大。¹¹

這人[顧頡剛]是陳源，我是早知道的，現在一調查，則他所薦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此人頗陰險，先前所謂不管外事，專看書云云的輿論，乃是全都爲其所欺。他頗注意我，說我是名士派，好笑。¹²

可是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顧頡剛之流已在國學院大佔勢力，周覽(鯁生)又要到這裏來做法律系主任了，從此現代評論色彩，將瀰漫廈大。¹³

既然對於廈大有這麼多不滿，辭職離去似乎是唯一的結果。可是，爲甚麼魯迅不願意回北京，或是到其他較大的城市像上海等，偏是選擇到廣州去？這是不是因爲他受到廣州的共產黨員的邀請而決意去廣州，還是另有原因？

首先，必須指出：即使背後策動邀請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是一批共產黨員；但毫無疑問，出面邀請的還是廣州中山大學的委員會，而不可能是一些學生像畢磊或徐彬如等。當時中大的委員會委員長是戴季陶，副委員長是顧孟余，另外還有朱家驊也是委員，他們全都是國民黨的元老。¹⁴

徐彬如的回憶錄裏，沒有清楚說明究竟是甚麼時候開始醞釀或發動邀請魯迅到中大

8 陳炳良也曾討論過這個問題，他主要反駁了郭沫若在《墜落了一顆巨星》中所提是由他和幾個共產黨員推薦魯迅到中大當教授的說法，參陳炳良《魯迅與共產主義》，載《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出版社，1987年7月，頁98。

9 《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頁117—118。

10 同上注，頁124—127。

11 同上注，頁131。

12 同上注，頁143。

13 同上注，頁146。

14 陳炳良在討論魯迅到中大教書的問題時也曾提到「請他去中山大學的朱家驊也是國民黨元老」，參陳炳良《魯迅與共產主義》，頁102。

去；而魯迅的日記則記載，在1926年11月11日上午接到中山大學的聘書。¹⁵可是，較早的時候——10月7日——許廣平便曾經向魯迅建議不如「喬遷」到廣州去：

厦大情形，聞之令人氣短，但以後如何對付呢？念念，如該處不能久居，喬遷何處呢？廣州似乎還不至如此辦學無狀，你也有熟人，如顧某 [顧孟余] 等，如現時地位不好住，也願意來此間嘗試否？¹⁶

雖然這看來只是隨口的提議，但可會就此挑起了魯迅的興趣？事實上，在十一天後，許廣平又再在信中提起此事：

中山大學停一學期，再整頓開學。文科的郭 [郭沫若] 也停聘了，將來是甚麼人才在這學校教授，現尚未定。你如有意，來粵就事，現在設法也是機會，像顧孟余，于樹德……你都可以設法。¹⁷

此外，還有在10月22日的信中也叫魯迅「不妨試一下」。¹⁸跟著的一天又馬上在另一封信說：「廣州雖云複雜，但思想也較自由，可發展的機會多，現代派此處是禁止的，所以不妨來。」¹⁹10月27日，許廣平說得更直截肯定，簡直是在游說魯迅到廣州去，叫他「不妨來助中大一臂」，又說：「我希望你們來。」²⁰

據一位研究許廣平的學者說，魯迅與許廣平確立愛情的關係是早在1925年10月。²¹事實上，在1926年廈門與廣州間的通信裏，我們可以見到他們二人的感情實在是很好的了。9月30日，魯迅給許廣平的信寫道：

聽講的學生倒多起來了，大概有許多是別科的。女生共五人。我決定目不邪視，而且將來永遠如此，直到離開廈門，和HM [害馬，指許廣平] 相見。²²

10月23日的信裏，他又說：

現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卻可以靜坐著默念HM，所以精神上並不感到寂寞。²³

15 《魯迅全集》，卷十四，頁623。

16 《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頁151。

17 同上注，頁168—169。

18 同上注，頁177。

19 同上注，頁178。

20 同上注，頁184。

21 參陳漱渝《許廣平的一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頁35。

22 《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頁144。

23 同上注，頁182。

從字裏行間不難看出魯迅是非常掛念而且很希望能夠早日見到許廣平的。既然在廈門大學也不感到滿意，而更有「我的所愛」²⁴在廣州慫恿催促，魯迅接受中山大學的聘書，便是很自然的事了。這跟有沒有共產黨員從背後推動是完全無關的；不單這樣，魯迅到廣州，就是跟國民政府也沒有關係。在作出了往廣州教書的決定後，魯迅寫信給許廣平時曾明確的說，他到廣州「並非追蹤政府，卻是別有追蹤。」²⁵

其實，那時候的魯迅，不單對共產黨沒有認識，而且很明顯是對國民黨有相當的好感的。在10月20日給許廣平的信裏，他說：

研究系比狐狸壞，而國民黨則太老實，你看將來實力一大，他們轉過來來拉攏，民國便會覺得他們也並不壞。……國民黨有力時，對於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於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但民黨復起時，卻又忘卻了。²⁶

雖然這段文字在魯迅自己出版《兩地書》時是給刪去了，²⁷但這正好顯示出了魯迅當時對國民黨的態度，跟後來他說國民黨壓迫文化活動、虐殺作家是完全不同的。

事實上，許廣平在北京的時候是加入了國民黨的，這點必須特別強調。²⁸10月27日，她給魯迅的信寫道：「共產書與人，在此 [廣州] 明目張膽，來此看看也好玩。」²⁹這種態度不能說是支持共產黨吧。另外，在跟魯迅談到廣東女師的學生風潮時，許廣平甚至說：

現時背後有國民政府，自己有權有勢，處置一些反動學生，實在易如反掌，貓和耗子玩，終久是吞下去的，你可知其得意了。³⁰

因此，雖然許廣平在廣州時曾經被人稱為「共產黨」³¹——這其實只是因為她支持國民黨左派——但她實際上是以身為國民黨員為榮的。

不能否認，魯迅初到廣州時，確是受到一些共產黨員的熱烈歡迎。據徐彬如的回憶，廣州的共產黨員在聽到魯迅決定到廣州的消息後，便馬上籌劃歡迎及爭取的工作，主要是

24 語出《我的失戀》，見《野草》，《魯迅全集》，卷二，頁169—170。

25 《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頁256。

26 同上注，頁172。

27 參《魯迅全集》，卷十一，頁162—164。

28 許廣平自己說過：「一到廣州，聽女子師範學校廖冰筠(廖仲凱的妹妹)校長說：是要我擔任『訓育』的事，這當然就應交出從北京帶去的『國民黨』關係證件了。在北京我曾加入國民黨左派。」見許廣平《魯迅回憶錄》，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頁67。這點陳炳良也指出過了，參陳炳良《魯迅與共產主義》，頁102。

29 《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頁186。

30 同上注，頁203。

31 參陳漱渝《許廣平的一生》，頁41。

由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部署、畢磊負責公開聯繫。³²雖然魯迅的日記中只記錄了一處畢磊的到訪——1927年1月31日：「下午……徐文雅、畢磊、陳輔國來，並贈《少年先鋒》十二本。」³³——但徐彬如卻說「畢磊和陳輔國幾乎每天都和他 [魯迅] 見面」；³⁴而魯迅日記記錄徐彬如的到訪只有三次，³⁵但他也說在廣州見過魯迅十多次。³⁶此外，他們還經常拿一些共產黨的刊物送給魯迅，魯迅日記中有記載的便有《少年先鋒》和《做甚麼》(魯迅誤記為《為甚麼》)。³⁷毫無疑問，魯迅這時候已清楚知道畢磊等人的身分，原因就在於這些刊物裏的文章。魯迅後來在《怎麼寫——夜記之一》裏，提到了畢磊：

現在還記得《做甚麼》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面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 [應為四月十五日晨] 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³⁸

這段文字雖然不能說是「寄予深切的悼念」，³⁹但惋惜及愛護之情是明顯可以見到的。事實上，如果我們相信徐彬如的說話，則似乎魯迅在這時候對於跟他接觸的共產黨青年很有好感。徐彬如說：

他對代表共青團和他接近的青年特別熱情，我們和他接觸，一次比一次感到親切，很快建立了感情。……魯迅對我們的感情是很真摯的。⁴⁰

據說，他們不單到魯迅的住所去探望他，畢磊等還經常和魯迅到陸園茶室吃茶。此外，魯迅還在畢磊和陳延年的秘書任旭安排下，秘密與陳延年見面，時間是在3月下旬。⁴¹陳延年當時是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書記，實際上是負責領導中共的廣東區委。不過，我們也不應利用這一點來強調魯迅在廣州時與共產黨的關係，原因是即使根據共產黨員的回憶，他

32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頁214。

33 《魯迅全集》，卷十四，頁641。

34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頁216。

35 那三次到訪是1月24日、1月31日及2月9日。參《魯迅全集》，卷十四，頁640、641及643。

36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頁216。

37 《魯迅全集》，卷十四，頁641、643。

38 同上注，卷四，頁21。

39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頁218；彭定安、馬蹄疾《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7月，上卷，頁420。

40 同上注，頁218。

41 同上注，頁217。

們也說魯迅提起陳延年時，說陳是他的「老仁侄」，⁴²這自然是指魯迅和陳延年父親陳獨秀早年在北京的交往而言，這次見面不一定有甚麼政治上的意義。

除了上面所引錄有關畢磊的一段文字外，魯迅的《怎麼寫》中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先抄錄了廣州報章上的一段報導，說「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甚麼》、《這樣做》兩刊物」，⁴³跟著便分析了《做甚麼》和《這樣做》這兩個刊物的性質：前者是「共產黨青年主持」，而後者「該是和《做甚麼》反對，或對立的」。魯迅說：

這裏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爲甚麼這麼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爲我新來而且灰色。⁴⁴

這段說話很重要，實際上是點出了魯迅在來到廣州時，是同時受到了左右兩派的拉攏的；而在別人以至魯迅自己心目中，他是不帶有任何政治色彩的。魯迅到廣州後的第一項公開活動，是1月23日應世界語會的邀請，到桂香廟環球學會參加歡迎德國世界語學者賽耳(Zeinile)的大會，這與政治完全無關。但他第二次的公開活動，便是國內學者經常提到的那次中山大學學生會爲魯迅召開的歡迎會，原因那是由學生會主辦的，而畢磊則是學生領袖，陪同魯迅出席。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這個歡迎會並不是由畢磊主持，而是朱家驊以特別黨部委員的身分主持的。⁴⁵朱家驊與魯迅同在1926年3月被段祺瑞通緝，且更出面邀請魯迅到中大任教；魯迅在廈門時的日記中便記錄了朱家驊多次來電催促他去廣州，⁴⁶二人這時的關係是很好的。到了廣州後，魯迅也多次到朱家驊的家吃飯，⁴⁷而朱也往訪過魯迅。⁴⁸因此，雖然魯迅不大喜歡朱家驊在歡迎會上對魯迅的吹捧，⁴⁹但由此可以證明魯迅在這個時期並不完全爲共產黨員所包圍及壟斷。就是徐彬如也承認由國民黨青年部長甘乃

42 同上注。

43 《魯迅全集》，卷四，頁20—21。

44 同上注，頁21。

45 許滌新《魯迅戰鬥在廣州》，《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4輯，頁335。

46 《魯迅全集》，卷十四，頁628。

47 同上注，頁640、642。

48 同上注，頁640、643。

49 據說，在歡迎會上，朱家驊奉承魯迅爲「革命家」、「戰士」，「魯迅對他的這種別有用心的吹捧，在講演中首先來一個反擊」。參馬蹄疾《魯迅講演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頁123—124。魯迅自己也談過這件事，但他沒有點明是反擊朱家驊，而是說「有些青年」：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甚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魯迅《通信》，《魯迅全集》，卷三，頁446）

光所支持的「『左派青年團』的人也去找魯迅，開頭魯迅對他們也很熱情」，⁵⁰其中一個來訪的就是魯迅1月24日——也就是歡迎會舉行前的一天——日記裏所記的「中大學生會代表李秀然」。⁵¹

此外，魯迅在廣州經常看的兩分報張《廣州民國日報》及《國民新聞》，⁵²都是屬於國民黨的：前者是國民黨的機關報，而後者則歸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直轄。1927年初，兩分報張都是由甘乃光任社長。⁵³事實上，它們還刊登過不少有關魯迅的文章，例如《民國日報》1926年11月15日《中大聘魯迅擔任教授》的預告，便是所見到最早有關的報導。⁵⁴此外，它們還獨家報導了魯迅在廣州的一些活動，如參加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大會、赴知用中學和赴夏令學術演講等，同時也在魯迅到廣州後不久即出版了歡迎專刊；⁵⁵而魯迅也曾在這兩分報紙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包括了重要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173至178期）以及《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11期）。由此可以證明：魯迅抵廣州後，其實不單是受到共產黨的歡迎，國民黨也努力爭取他的合作。換言之，我們不應過分強調共產黨員在爭取魯迅的努力以及他們對魯迅的影響。

在抵達廣州的初期，魯迅似乎受了這「革命策源地」的氣氛所影響，時常談到革命的問題。我們可先看看一些例子。

為紀念3月29日的黃花節，魯迅寫了一篇雜感，裏面提到他在北京所見過的中山紀念日，很是熱鬧，但在熱鬧的氣氛中他想起了革命家的偉大；跟著，他提出了革命無止境的說法：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甚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⁵⁶

這樣強調革命的態度，在魯迅這時候所寫的文章及演講中不斷出現。在中山大學開學儀式上的演說中，他也重覆了孫中山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一句話，還肯定了「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的口號，更說中山大學的責任是要把人引導「向前進行到

50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頁215。

51 《魯迅全集》，卷十四，頁640。

52 同上注，卷四，頁20。

53 參李江《與魯迅有關的廣東報刊》，《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4輯，頁445—446。

54 同上注，頁189。

55 《紀念總理二周年之宣傳方法》，《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11日，同上注，頁201；《新文學巨子魯迅先生之公開演講》，《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7月16日，同上注，頁20。

56 《黃花節的雜感》，《魯迅全集》，卷三，頁410。

革命的地方」，而「青年應該放責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偉力擴大！」⁵⁷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的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裏，他更說革命足以影響文學，「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才是拯救中國之道。⁵⁸

在這情況下，我們實在不能不同意一些大陸學者所提出的一個說法：魯迅這時候「把文學問題、青年的讀書學習以至戀愛問題如此緊密地直接聯繫革命問題，每一篇演說或雜感都具有服務於當前革命鬥爭的政治目的性，都具有鮮明地宣傳革命的強烈鼓動性，這是來廣州前不曾達到的。」⁵⁹可是，我們能不能就此便帶出「革命」的概念已明確注入「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的涵義，說魯迅已經與共產黨思想完全一致，取得了無產階級的立場？⁶⁰

我們應該仔細看看魯迅對於「革命」一詞的理解。

首先，在上面談到的《黃花節的雜感》裏，魯迅所提到的革命家，毫無疑問是指孫中山先生。由他所領導的革命，也毫無疑問是指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與共產黨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無關。事實上，從他在黃埔軍官學校的演辭中，我們更可以清楚知道「革命」一詞，在那時候的魯迅來說，是一個含義很廣泛的詞語，包括了一切反對舊的、要求改革、進步的活動，有時候他甚至把「革命」跟「進化」混為一起：

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⁶¹

又說：

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⁶²

這觀點在上引他在中山大學開學儀式的演說中又再次出現：

本來青年原應該都是革命的，因為在科學上已經證明：人類是進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十萬年前吧……後來才有了原人。雖然慢得很，但可見人本來是進化

57 《讀書與革命——三月一日在中山大學開學典禮會講》，《廣東青年》，第3期，1927年4月1日，錄自馬蹄疾《魯迅講演考》，頁172。

58 《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卷三，頁423。

59 正一《魯迅思想發展論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頁195—196。

60 同上注，頁196。

61 《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卷三，頁418。

62 同上注，頁418—419。

的前進的，前進即革命，故青年人原來尤應該是革命的。但後來變做不革命了，這是反乎本性的墮落。⁶³

這樣給「革命」的定義，跟共產主義者所說的階級鬥爭，簡直有天淵之別。因此，雖然我們承認魯迅是越來越強調實際革命行動的重要性，但卻不能說「他已經越來越看清了階級鬥爭最後還是要靠武裝革命解決問題」。⁶⁴此外，我們還可以看看魯迅在這時候所提到的中國革命具體指些甚麼。

在《革命時代的文學》裏，魯迅多次談到中國當時的革命，其中一處他說：

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⁶⁵

很明顯，魯迅以孫傳芳為例子解釋中國需要「實地的革命戰爭」，就是把中國的革命聯繫到孫傳芳上去，那所指的就是對抗軍閥的北伐活動，這跟當時的政治形勢是一致的。我們知道，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通過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決定，體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那時候，中國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北方軍閥統治。事實上，1925年6月，國民黨便將國軍及黨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翌年7月，蔣介石就職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儘管這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基礎並不穩固，但共產黨差不多最重要的黨員都全加入了國民黨。他們並不怎樣的宣揚階級革命思想，更不要說推翻國民黨了。因此，這時候的「革命」跟國共分裂後的「革命」，含義是不一樣的。

對於北伐的進展，魯迅是非常留意的。還在廈門的時候，他寫給許廣平的信中便經常談到北伐的情況。這種關心北伐進展的態度，在一篇慶祝北伐軍收復上海和南京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這篇名為《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的文章中，魯迅首先便明確說出自己對於北伐軍收復南京和上海感到十分高興。他說：「滬寧的克復，在看見電報的那天，我已經一個人私自高興過兩回了。」這其實已很清楚的點出了魯迅當時並沒有反對國民黨的立場，原因是領導北伐的便正是國民黨的蔣介石。如果我們說魯迅早已預見到蔣介石會實行清黨，便不可能會寫這篇文章；必須留意的是這篇文章是在4月10日寫成的。此外，文章還提到當時是「革命」「小有勝利」的時候，這也證明魯迅心目中的「革命」是指國民黨所

63 《讀書與革命——三月一日在中山大學開學典禮會講》，頁172。

64 杜一白《魯迅思想論綱》，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頁148。

65 《魯迅全集》，卷三，頁423。

領導的北伐；他還勸勉人們不要「陶醉在凱歌中，肌肉鬆懈，忘卻進擊」，⁶⁶這當然也是指整個中國的國民革命而言。況且，魯迅在文章裏說廣州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可能說是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原因是在這以前，中共在廣州並沒有甚麼重要的革命行動。相反來說，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便是在廣州舉行，而廣州也是籌備及誓師北伐的地方，所以才配得上「革命策源地」的稱號。

此外，有人認為魯迅在談論革命的問題時，提出了革命無止境，革命者必須堅持不懈的觀點，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基本精神，也可以說是魯迅的思想已初步跨上無產階級世界觀的高度的一種表現」，⁶⁷這也是言過其實的。《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固然具體的發揮了「革命無止境」的思想，這點在上面已討論過了。可是，雖然這篇文章中徵引了列寧的說話，但這思想應該是來自他個人的經驗，而不是因為他剛剛讀過列寧的著作而吸納了這種思想。那時候年屆四十六，有豐富人生經驗的魯迅，從客觀環境中已深深體會到「革命」的真正意義在於能夠堅持下去。在《〈自選集〉自序》中，他便說過：

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⁶⁸

這教訓使他知道革命要有真正的成果，便必須繼續前進，永遠進擊。

事實上，這種思想在魯迅是很早便已經形成了。早在1923年12月26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上所講演的《娜拉走後怎樣》中，便已強調過對敵鬥爭要「韌」，要「鍥而不舍」。⁶⁹這點在1925年中給許廣平的一封信裏又重新提到：

我記得先前在學校演說時候也曾說過，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只有一法，就是

66 《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同上注，卷八，頁162。有人認為這篇文章「是無可挑剔的馬列主義思想結晶」，原因是：

在慶祝滬寧克復的一片鑼鼓聲中，魯迅看到了正在孕育中的蔣介石反革命政變的嚴重危機。他告誡人們不要「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鬆懈，忘卻進擊」。他嚴正指出：慶祝的「盛典」雖然很多，但是，在陰暗的角落（「黑暗的區域」）裏，「反革命者的工作也在默默地進行」，切不可等閒視之。……這些論述，不僅表現了魯迅對蔣介石反革命叛變活動的清醒認識，也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當頭棒喝。（袁良駿《魯迅思想的發展道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2月，頁47—48）

這不僅是不明白魯迅當時對革命一詞的理解，而且也明顯是一種故意的誤讀。

67 杜一白《魯迅思想論綱》，頁162。

68 《魯迅全集》，卷四，頁455。

69 同上注，卷一，頁162—164。

「韌」，也就是「鏗而不舍」。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於比「踔厲風發」無效的。⁷⁰

更著名的當然是1925年底寫成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費厄潑賴」一詞是英文 fair play 的譯音，原是林語堂在一期《語絲》上撰文提倡的，他要求人們「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⁷¹儘管魯迅當時跟林語堂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卻不同意這見解。他認為「打落水狗」是必須的，因為「狗性總不大會改變」，「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他還舉出民國革命為例，最初寬恕了很多官僚士紳，但他們後來卻幫助袁世凱來「咬死」許多革命志士；而曾經捉住了殺害秋瑾的主謀、但後來又以為不應「再修舊怨」而把他釋放了王金發，最後也是被人害死，其中最賣力的就是那個殺害秋瑾的主謀。⁷²由此可見，這種堅持鬥爭的思想，原來是魯迅一貫的看法，也是他從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得出來的結論。除非我們承認魯迅早在1923年便已深深了解馬列主義，否則，我們只能說是巧合，而二者都是透過實際的經驗而得出來的道理吧了。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也應該承認這時期魯迅的思想確是起了變化。他自己也說過：「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⁷³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他已經放棄了早期所信奉的尼采超人論思想。這趨勢在他還沒有來廣州時便已開始了，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的演講中，魯迅說：

因為這個學校是平民的學校，所以我就不能不來，而且不能不說幾句話。你們都是工人農民的子女，你們因為窮苦，所以失學，所以須到這樣的學校來讀書。但是，你們窮的是金錢，而不是聰明與智慧。你們貧民的子弟一樣是聰明的，你們貧民的子弟一樣是有智慧的。你們能夠下決心，你們能夠奮鬥，一定會成功，一定有前途。沒有甚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叫你們永被奴役；也沒有甚麼的命運註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⁷⁴

70 魯迅1925年4月14日給許廣平信，同上注，卷十一，頁46。

71 林語堂在1925年12月14日《語絲》第57期上發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裏面說：

「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卻不可沒有這一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捱罵。且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於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錄自《魯迅全集》，卷一，頁277。）

72 同上注，頁273。

73 《答有恒先生》，同上注，卷三，頁453。

74 李淑美《魯迅支持廈大平民學校》，錄自馬蹄疾《魯迅講演考》，頁107—108。另陳夢韶《魯迅在廈門的五次演講》也有相近的說法，但他也主要是根據李淑美的回憶，見《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4輯，頁99。不過，必須強調的是李淑美的回憶是寫於幾十年後，在當時完全沒有記錄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差不多把整篇演講的內容重寫出來？這也是值得懷疑的。

這種重視平民百姓的思想，跟從前說「任個人而排衆數」、「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衆人而希英哲」⁷⁵是很不同了。

來到廣州以後，這種改變更爲明顯。在《革命時代的文學》裏，他多次提到平民的問題。例如在討論到革命成功後會出現些甚麼樣的文學時，他推想「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爲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⁷⁶此外，他還詳細的討論了當時一些以平民爲材料的作品，其實不是真正的平民文學，「因爲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即使是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也不是真正的平民之音，原因是這些平民完全受了古書及紳士思想的影響。魯迅說：

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⁷⁷

這樣的強調工人農民的解放，確是魯迅從前沒有表現過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時候他具名簽署，發表於創造社機關刊物《洪水》上的《中國文學家對於英國智識階級及一般民衆宣言》。

1927年2月20日，魯迅在日記上記下「得成仿吾信」。⁷⁸據說，成仿吾在信中邀請魯迅聯名簽署這分宣言。⁷⁹據一位大陸學者考證，這分宣言起草於4月以前，但發表是在5月中旬或下旬以後。⁸⁰具名簽署這分宣言的有四人，成仿吾第一、魯迅第二，餘下的二人是王獨清及何畏，都是創造社的成員。⁸¹宣言正文前附有一段說明性的文字，裏面有這樣的一句：

在這裏簽名的人都是本人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確有信心的，所以特別鄭重。⁸²

不少人根據這句說話，認爲魯迅是公開宣稱他支持無產階級革命，⁸³但也有人認爲這段說

75 參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卷一，頁46、52。

76 同上注，卷三，頁421。

77 同上注，頁422。

78 同上注，卷十四，頁644。

79 張傲卉《成仿吾與魯迅》，《東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6期，1981年11月，頁25。

80 倪墨炎《魯迅署名宣言與函電輯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4月，頁33；而發表這分宣言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版權頁上原署1927年4月1日。

81 宣言全文見同上注，頁27—32。

82 同上注，頁27。

83 參杜一白《魯迅思想論綱》，頁163、165；皮遠長《試論魯迅世界觀的轉變》，載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室編《論魯迅前期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頁178—179。

明文字是後來才加上去的，⁸⁴換言之，魯迅可能事先沒有看過。這點其實不太重要，因為宣言正文裏面也提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下面徵引一些例子：

我們從事於中國無產階級國民革命的文學家等今致書英國無產階級，intelligentsia及一切工人，想對你們表示些意見和希望。……我們平時看見工人在貨物自動車上，在馬路上奔馳時，我們已經覺得將來建設新社會的是他們，但我們更看見他們底團體行動的時候，我們便更覺得他們將來的威力。不管那些向後倒退的帝國主義者向「未來的支配者」怎樣地開炮，但「未來」究竟是他們的。我們無產民衆底組織，運動意識等正在向前前進，但榨取我們底外國資本家卻天天在那兒後退。⁸⁵

宣言也攻擊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說那是「快要崩解的惡毒的資本帝國主義」，又呼籲「世界無產民衆趕快起來結合去打倒資本帝國主義」，「我們現在第一要爲了打倒資本帝國主義而團結」；宣言最後更明確的提出階級鬥爭：

總之世界底無產民衆在此階級鬥爭激烈的時候，不由得不團結起來。⁸⁶

儘管我們可以毫無疑問的相信宣言不是出自魯迅手筆，但他願意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這點是探討魯迅在廣州時期的思想問題時不能忽視的一個重點。

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應該可以這樣說，在國民黨清黨的前夕，魯迅基本上還是支持國民黨的。他特別留意由國民黨所領導的北伐活動，這也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國革命。不過，由於中共黨員積極的與他接觸，而那時候的共產黨還是有著合法的地位，且是國民黨北伐的伙伴，加上魯迅自己在幾年前已開始閱讀有關蘇聯以及馬列主義方面的作品，所以，魯迅這時期對共產黨的認識是較前深了。不過，我們卻不能因此便說魯迅當時已是一個馬列主義者。在他轉向共產黨的路途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是蔣介石在4月中突然發動的清黨行動。

上文說過，1924年初，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接納中共黨員加入，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但很明顯，這次兩黨合作並沒有良好的基礎，似乎主要是繫在孫中山一人身上。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不久，國民黨內部已有不少人提出要求制裁共產黨活動。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8月20日，廖仲凱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內被刺；10月23日，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發表反共宣言；1926年3月20日更有「中山艦事件」。因此，雖然國共兩黨在

84 倪墨炎《魯迅署名宣言與函電輯考》，頁33。

85 同上注，頁27。

86 同上注，頁32。

1926年中一起誓師北伐，但實際上這次國共合作早已出現了嚴重的危機。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大舉拘捕共產黨員。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而共產黨的實力也大受打擊。

魯迅在廣州目睹了4月15日的清黨行動。在這之前，他對廣州的印象大抵不錯。初來廣州不久，他給韋素園的信中說：廣州的「民情，卻比別處活潑得多」。⁸⁷但這並不是說魯迅完全沒有甚麼憂慮，他說過：

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裏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⁸⁸

此外，據說他剛到廣州後不久便說過：他「聽說廣東很革命，赤化了，所以決心到廣州來看看，來到後果然滿街都是紅標語。但仔細一看，那些標語都是用白粉寫在紅布上的，『紅中夾白』，有點可怕！」⁸⁹不過，這並不是說魯迅在到達廣州後不久，便已經覺察到國共合作出現了問題，更不應說魯迅已看出國民黨會實行清黨，所以特別向共產黨員提出警告。⁹⁰這點我們在上面分析魯迅對革命的看法時已證明了。

那麼，究竟國民黨的清黨行動對於魯迅造成了甚麼影響？

我們知道，在廣州也實行清黨後，由於不少中大學生也被捕，魯迅在4月15日當天下午便回校開了一個緊急會議。⁹¹曾經參加了會議的何思源強調說：這個會議「是魯迅召集開會，不是別人召集」；⁹²此外，據一位當時負責編印校報，因而得到消息的中大學生周鼎培說：魯迅在4月15日下午便已經回學校教務處，發出通知召開各科系主任營救學生的緊急會議。⁹³這都可以證明魯迅當時是非常積極的嘗試去營救學生的。不過，我們卻不能因此而過分強調魯迅是努力去營救共產黨員。這裏先徵引何思源回憶魯迅在緊急大會裏的說話：

魯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驊坐在魯迅的正對面。魯迅說：「學生被抓去了，學校有責任，校長不出來，現在我來召開會，請大家來說話，我們應當像是學生的家長，要對學生負責，希望學校出來擔保他們。我們也要知道為甚麼抓去他們？有甚麼罪？」……魯迅對朱家驊說：「學生被抓去了，是公開的事實。被捕的學生究竟違

87 魯迅1927年1月26日給韋素園信，《魯迅全集》，卷十一，頁527。

88 《在鐘樓上》，同上注，卷四，頁33。

89 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4輯，頁320。

90 許滌新《魯迅戰鬥在廣州》，同上注，頁335—336；又參杜一白《魯迅思想論綱》，頁144；正一《魯迅思想發展論稿》，頁193。

91 《魯迅全集》，卷十四，頁652。

92 何思源《回憶魯迅在中山大學情況》，《魯迅研究資料》，第3輯，1979年2月，頁235。

93 周鼎培《回憶中山大學「緊急會議」情況》，同上注，頁241。

背了孫中山總理的三大政策的那一條政策？」……魯迅堅決說：「現在根據三大政策的活動，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統治。」……魯迅主張營救學生，他堅持說：「這麼多學生被抓去，這是一件大事，學校應該負責，我們也應該對學生負責。」⁹⁴

從這大段引錄的談話裏，我們可以見到魯迅的立論主要有兩點：第一，被捕的都是中大的學生，學校當局自然應負責查詢及具保。換言之，魯迅之所以出面營救學生，完全是因為他當時是中大的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所以要對學生負責；這與學生的思想或行動無關。第二，被捕的學生沒有犯上甚麼嚴重的錯誤，不應該受到拘控。值得注意的是：何思源說魯迅兩次提到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當然，這三大政策裏有「容共」的一條，但魯迅以此為論據，其實就是說他願意從國民黨的立場去處理這件事，絲毫沒有抗拒國民黨統治或庇護共產黨員的意思。

此外，我們也不能接受許壽裳、許廣平及其他人所說魯迅因為營救學生失敗而辭去中大的職務。⁹⁵誠然，魯迅正式呈辭是在清黨以後(4月21日)，不過，從魯迅幾封給朋友的信裏，我們可以見到魯迅辭職是別有原因的。4月20日，他寫信給李霽野說：

我在廈門時，很受幾個「現代」派的人排擠，我離開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為從北京請去的教員留面子，秘而不說。不料其中之一[顧頡剛]，終於在那裏也站不住，已經鑽到此地來做教授。此輩的陰險性質是不會改變的，自然不久還是排擠，營私。我在此的教務，功課，已經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閉氣。所以我決計於二三日內辭去一切職務，離開中大。⁹⁶

幾天後，他寫信給孫伏園時又再說道：

我真想不到，在廈門那麼反對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到這裏來做教授了，那麼，這裏的情形，難免要變成廈大，硬直者逐，改革者開除。而且據我看來，或

94 何思源《回憶魯迅在中山大學情況》，頁236—237。

95 最早提出這說法的是許壽裳，他所編的《魯迅年譜》在1927年4月項下寫道：「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魯迅年譜》，錄自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6月第一版，1978年6月新版，頁124。許廣平及其他大陸學者多主此說。參許廣平《廈門和廣州》，載《許廣平回憶錄》，頁70—71；徐彬如《回憶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的情況》，頁321—322；王觀泉《魯迅年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頁82；袁良駿《魯迅思想的發展道路》，頁48。在中國大陸，持相反意見的——說魯迅不是因為營救學生無效，而是不滿中大聘用顧頡剛而辭職的——似乎只有陳漱渝一人；參陳漱渝《魯迅為甚麼辭去在中山大學的職務？》，《魯迅研究資料》，第6輯，1980年10月，頁254—258。另外陳炳良也提出過相同的意見，參陳炳良《魯迅與共產主義》，頁102。

96 魯迅1927年4月21日給李霽野信，《魯迅全集》，卷十一，頁540。

者會比不上厦大，這是我新得的感覺。我已於上星期四辭去一切職務，脫離中大了。⁹⁷

在上面，我們見過魯迅在厦門時對顧頡剛有很大的不滿，因此，不願意與他一起在廣州中大任教，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了。此外，魯迅給孫伏園的這封信，由於孫將它公開發表在漢口《中央副刊》上，顧頡剛更擬提出訴訟，並寫信給魯迅，要他留在廣州答辯。⁹⁸二人之不能相容，在這件事中清楚顯示出來。

其實，除了魯迅自己所寫的文字外，當時一些環繞著魯迅的人，不少也清楚知道魯迅辭掉中大的教職，是與顧頡剛有關的。例如當時與魯迅十分接近的學生謝玉生，在那年4月25日便曾致函孫伏園，談到這個問題：

迅師本月二十號，已將中大所任各職，完全辭卸矣。中大校務委員會及學生方面，現正積極挽留，但迅師去志已堅，實無挽留之可能了。迅師此次辭職之原因，就是因顧頡剛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來中大擔任教授的緣故。顧來迅師所以要去職者，即是表示與顧不合作的意思。原顧去歲在厦大造作謠言，誣蔑迅師；迄厦大風潮發生之後，顧又背叛林語堂先生，甘為林文慶之謀臣，伙同張星煊、張頤、黃開宗等主張開除學生，以致此項學生，至今流離失所，這是迅師極傷心的事。⁹⁹

而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在一封寫於5月23日給周作人的信中也提及這事：

魯迅確因頡剛辭職，和季第同辭。傅斯年乃信寄頡剛，囑其暫緩去，頡剛謂必去試，遂到廣州。於是傅以五萬元囑頡剛到上海購古書，今日聞頡剛已到上海。但魯迅謂廣大有頡剛之名字寫著便不教；近當在挽留中，但聞他不肯去。¹⁰⁰

事實上，魯迅自己便曾清楚說過他離開中大，其實與清黨完全無關，那是在5月30日寫給章廷謙的信：

不過事太湊巧，當紅鼻〔顧頡剛〕到粵之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遠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顧傅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於政治而走之

97 魯迅1927年4月26日給孫伏園信，同上注，頁542。

98 參魯迅《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同上注，卷四，頁39—40。

99 孫伏園《魯迅先生脫離廣東中大》，《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第48號，1927年5月11日，同上注，頁40—41。

100 周建人1927年5月23日致周作人信，《魯迅研究資料》，第12輯，1983年5月，頁77。

宣傳，聞香港《工商報》，即曾說我因「親共」而逃避云云，兄所聞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然而「管他媽的」可也。¹⁰¹

這一方面證明了魯迅並不是因為清黨而被迫離開中大，另一方面更否定了他是「親共」的「流言」。

事實上，在清黨以後，他留在廣州的一段期間裏，魯迅是比從前沉默得多。幾個月裏只寫了幾篇短文章，也沒有怎樣的提到清黨的問題。最廣為人徵引魯迅談清黨的文章是9月4日寫成，10月1日發表的《答有恒先生》，但這離開清黨差不多有五個月之久。在這之前，魯迅討論清黨而見諸文字的，是4月20日一封寫給李霽野的信，魯迅在信裏說：

這裏現亦大討其赤，中大學生被捕者有四十餘人，別處我不知道，報上亦不大記載。其實這裏本來一點不赤，商人之勢力頗大，或者遠在北京之上。被捕者蓋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這幾天放了幾個。¹⁰²

這段文字記述得很平淡，一點激動或憤怨之情也沒有。在跟著的幾個月裏，他的私人信件中也沒有再談清黨之事。這也證明了魯迅在清黨後馬上轉向左傾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不過，我們也不能說國民黨的清黨行動對魯迅沒有造成任何影響。沉默了幾個月後，魯迅在9月間突然多產起來。由3日至27日，他一共寫了雜文十七篇，裏面直接或間接觸及到清黨問題的地方為數也不少；最直接的是他給時有恒解釋為甚麼自己近來變得沉默了：

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¹⁰³

他稱這次事件為「血的遊戲」，¹⁰⁴其中他特別不能忍受的是手段上的殘暴。在談到這次捕殺時，他說：

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羣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顆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麼？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¹⁰⁵

101 魯迅1927年5月30日給章廷謙信，《魯迅全集》，卷十一，頁545。

102 魯迅1927年4月20日給李霽野信，同上注，頁541。

103 《答有恒先生》，同上注，卷三，頁453。

104 同上注，頁454。

105 同上注，頁453—454。

據說，魯迅知道在廣州時經常探訪他的畢磊是「被鐵鏈鎖住了死的」。¹⁰⁶

此外，魯迅更不滿意的還在於許多無辜的人在「清黨」、「討赤」的名義下被枉殺。他曾諷刺的說過：「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¹⁰⁷在別的地方又說：

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麼，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¹⁰⁸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准穿破衣衫，否則便是共產黨。¹⁰⁹

事實上，魯迅知道曾經有人想證明他是共產黨員，證據是他曾在陳獨秀辦的《新青年》上發表文章。¹¹⁰魯迅把這經驗總結下來：

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憂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¹¹¹

這一切都顯示國民黨的清黨行動對魯迅來說確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究其原因，是他在此以前支持國民黨，而且曾寄與厚望，因而對於清黨行動產生激烈的反應。此外，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在這個時候，他多次提出過一個問題：越來越多人自稱參加了革命時應怎樣？在一次演講中，他說：

譬如有一個軍閥，……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够，他還要作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¹¹²

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

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¹¹³

106 彭定安、馬蹄疾《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上卷，頁424。

107 《小雜感》，《魯迅全集》，卷三，頁533。

108 《可惡罪》，同上注，頁494。

109 《小雜感》，同上注，頁532。

110 《答有恒先生》，同上注，頁456。

111 《扣絲雜感》，同上注，頁485。

112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同上注，頁513。

113 《在鐘樓上》，同上注，卷四，頁33。

這些說話正好顯示他對國民黨還是諒解的。言下之意，他認為只是其中有些人濫用了革命之名，盜竊革命的果實，以致「戒律蕩然」，但這卻不是國民黨或革命本身的錯誤。

事實上，即使是在9月所寫的十多篇雜文裏，其中部分雖然抒發了對清黨行動的不滿，但也不見得有支持共產黨的意思在內。9月底所寫的一段《小雜感》很有意思：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甚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114

這似乎證明他看見的並不是單方面的屠殺。更重要的是一封寫於該年底的私人信件，魯迅在信裏說：

時事紛紜，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近兩月來，凡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115

這便說出了魯迅一時還不能明白政局的形勢，不願罔加評論。由此再進一步證明：一些學者說魯迅在清黨後馬上轉而左傾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除此之外，似乎魯迅在這次清黨行動中另一個很深的感受，在於對青年人的幻滅。這點在幾處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116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117

114 《小雜感》，同上注，卷三，頁532。

115 魯迅1927年12月19日給邵文煊信，同上注，卷十一，頁604。

116 《答有恒先生》，同上注，卷三，頁453—454。

117 《〈三閑集〉序言》，同上注，卷四，頁5。

一方面對於本來極有好感的國民黨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一直以來的信仰——「進化論」——被轟毀，加上他已放棄了早年的「超人論」思想，這對魯迅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很大的心理危機。對於前途，魯迅不單沒有寄與希望，且感到黑暗和悲觀。他對時有恒說：「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 [血的遊戲] 的收場」，「恐怖一去，來的是甚麼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¹¹⁸對臺靜農說：「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¹¹⁹在給黎錦明的小說《塵影》作題辭時，他說得更清楚：

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是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¹²⁰

這種灰暗、徬徨、無望的態度，足以證明大陸一些學者所說魯迅在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後馬上有「思想上的飛躍」、變成共產主義者的說法是錯誤的。

事實上，魯迅就是在這種悲觀絕望的心境下，於9月27日離開廣州，乘船赴上海，在那裏渡過生命的最後十年。在離開廣州後，他寫過這樣一句：

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¹²¹

這正是魯迅「廣州之行」的真實寫照。

1991年7月

118 《答有恒先生》，同上注，卷三，頁454、457。

119 魯迅1927年9月25日給臺靜農信，同上注，卷十一，頁580。

120 《〈塵影〉題辭》，同上注，卷三，頁547。

121 《在鐘樓上》，同上注，卷四，頁33。

Lu Hsün in Canton: A Chapter in *Lu Hsü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 Summary)

Wong Wang-chi

The paper covers a brief yet significant period in Lu Hsün's life—his stay in Canton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1927. Apart from discussing his deeds and writings in these nine months, it concent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tempting to clarify som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relating to Lu Hsün's subsequent turn to the left.

The Canton period is important in our study of Lu Hsün and the CCP because Lu Hsün was first formally approached by CCP members at that time. In a number of speeches made in Canton, Lu touched upon the issue of "people's literature". Further he witnessed the *coup d'état* launch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gainst the Communists in Canton in April. Lu Hsün said in retrospect that he was horrified by the massacres.

Having said all these,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paper still intends to argue, against the prevailing view among mainland Chinese Lu Hsün scholars, that Lu Hsün was by no means close to the Communists at that time, not to say that he himself had already been converted to Marxism. It is pointed out here that Lu Hsün was attracted to Canton, not by the presence of the Communists, but by that of his lover, soon to become his common-law wife, Hsü Kuang-p'ing. While it is true that Lu was approached by the Communists, he was also surrounded by right-wingers, as all the top positions of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were filled by senior members of the KMT. Lu had not yet started reading systematically Marxist works and his discussion on "people's literature" did not mention anything about proletarian class struggle. Though dismayed at the KMT *coup*, he resigned the teaching post at the university for private reasons, not because, as most people have suggested, he protested against the KMT regime.

Nevertheless, while believing that there was much exaggeration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Hsün and the CCP in past discussions of the topic, the author also feels that the impact of his brief stay in Canton on Lu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Lu Hsün himself claimed,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his belief in evolution was shattered. Some scholars maintain that Lu Hsün experienced a psychological crisis after he had witnessed the massacres in Canton. Disappointed with the KMT, he looked for new ways to save China, and this opened the way to his subsequent conversion to Marxism.